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

第6辑

中国 近代 文学 评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评林

(第六辑)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鉴江

封面设计：黄丽雅

责任技编：李穗成

中国近代文学评林

(第六辑)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石牌华南师大)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00,000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18-02241-3/I.291

定价：18.5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试论中国近代文学的民族精神

陈永标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学艺术及其民族精神。鸦片战争后，在近百年激烈动荡社会生活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文学，以其求新求变的文化新姿，形象地再现了中华儿女为捍卫民族尊严、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饱含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汇成了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文学主潮，呼唤起全民族的觉醒，孕育了无数仁人志士的献身精神，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有力地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全面革新。

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全民族抗敌精神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依仗其“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统治者锁闭着的大门，接踵而来的，便是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等等。列强入侵，清政府屈辱投降，在短短的时间里，清朝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诸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侵略者蚕食中华大地，蹂躏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陷入深沉灾难和社会危机。但正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J. Toynbee, 1889—1975）于本世纪初所言：“就中国人来

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在民族受难的日子里，中华儿女忧时悲愤，同仇敌愾，团结御侮：“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①，“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②。中国近代文学的民族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全民族抗击外侮的斗争精神，而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近代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

早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率先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封建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③衰世的到来，以诗文抨击时政。道、咸年间，中国人民经历了鸦片战争，社会的巨大变动和国家的内忧外患，迫使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惊醒起来，涌现出像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林昌彝、梁廷楠、周济、汤鹏、鲁一同、朱琦、姚莹、包世臣等一批具远见卓识的作家和文人学士，他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动荡与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倡言“经世致用之学”；他们面对民族灾难和侵略者的残暴掠夺，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以犀利的笔触，写下很多忧世伤时、满怀悲愤的诗文，饱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为民族而战的感情。林则徐禁烟未果，虽遣戍伊犁，但仍忧患国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④充分表达了一位“封吏大臣”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国事为重的赤诚爱国之心。中英鸦片战争最先在广东燃起，鸦片的流毒，英国侵者的野蛮残暴，尤其是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的英雄事迹，激起了年事六十的诗人张维屏的义愤和爱国热情，书写出《书愤》、《海门》等忧时愤懑之作，生动地展示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壮丽场面，盛赞三将军英勇捐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侵略军魔爪继续伸向我国东南沿海，厦门被占，定海、宁波沦陷，镇江失守，台湾危急，侵略军的残暴，人民群众的被蹂躏，引起闽籍诗人张际亮、临佳作家朱琦、浙江镇海诗人姚燮等的忧虑和愤慨。他们高

举反侵略的旗帜，以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河骂，一皆托诸于诗”^⑤。朱琦抒写的《老兵叹》、《感事》、《王刚节公家传书后》、《关将军挽歌》，姚燮的《闻定海城陷》、《北村妇》、《兵巡街》、《捉夫谣》，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十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杞忧》等等诗篇，或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庸臣的降，或暴露英国侵略军淫掠中国人民的罪行，或描绘人民群众奋起反侵略的斗争，或悲愤国土沦丧；或歌颂为保卫中华民族而战的爱国将领的凛然正气。他们从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中选取题材，多采用组诗或乐府诗体形式，透过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憎感情融化于具象描写之中，所作诗章，以抗争、救国为基调，以严禁鸦片、抗击外来侵略、心忧民族厄运为主题。在广阔的斗争画面上，展示了中华儿女在鸦片战争中抗击外侮、为捍卫民族独立主权而战的昂扬的民族精神。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探索为实现人生理想过程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的艺术体现。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认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独特基调。”在我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李、杜，从陆游、范仲淹、辛弃疾到吴伟业和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文，无不渗透着安社稷、建功立业和济苍生、匡时济世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忧患意识，凝聚着作家历史责任感而激发的痛楚感情。他们于社稷倾覆、生民涂炭之时，以其作品实现了对国家民族的真诚与同情，使之具有高度的人民性。但近代以前的作家，毕竟还站在“忠君”的立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而寄寓自己的忧患济世之才的。到了近代，作者目睹民族灾难深重，人民疾苦血泪斑斑，忧患意识

己冲破“忠君”和儒学伦理观的束缚，而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去洞察时局，关心民族，倾诉自身的忧愤和关切之情。小说家李伯元说：“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⑥刘鹗是带着哭泣，带着念家国、民族、种教之感情，从哭泣与醒世的情感交织中创作《老残游记》的。⑦就连治学严谨的学者陈澧，也曾作《炮子谣》：“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年轻的谭嗣同，眼看中华大地被“瓜分豆剖”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崖何处是神州？”⑧爱国诗人丘逢甲，面对国家主权丧失，誓志为国出力：“未报国仇心未了，枕戈重与赋无衣。”⑨诗僧奇人苏曼殊，也对祖国饱受外敌的欺凌而悲愤填膺：“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⑩等等。他们均以自己的创作寓寄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流注了真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从甲午战争的惨痛、屈辱和悲愤中惊醒过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改革文化思潮，孕育了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杨深秀、林旭、刘光第、汪康年、唐才常、熊希龄、康广仁、杨锐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他们于国家遭难、民运垂危的年代，满怀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开始实现新型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他们既继承发扬了我国历史上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同时又面对现实，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当起以文艺为武器启蒙和唤醒民众的责任。他们是政治家，躬身投身变革现实的斗争；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从而在近代文化的历史背景下，推进了“忧患意识”以及抗击外侮侵略的民族斗争精神。足涉英伦、学贯中西的严复，以其“自强保种”的爱国心，首先向国人

介绍西方社会进化论，用以取代我国传统的“变异说”和“体用论”，进一步催化了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的自觉民族意识，引发起以救亡国存为目标的忧患意识的深化和观念形态更新。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中国是一个统一了数千年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认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国家，主张发扬数千年中华优秀文明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的中西汇通原则，把争取民族独立，重建国体与国家统一的目标紧紧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变革求新、奋发自强、振兴中华，以及睁眼看世界，坚持民族平等的新观念，于20世纪初，极大地开拓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增强了作家、思想家的历史使命感、主权意识和凝聚全民族的团结抗争意识，也深深影响到近代文学的创作，振奋近代作家为民族奋进，和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而斗争的文学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随着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继承资产阶级维新派文学革新运动传统，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从事诗文创作和戏剧改良，为辛亥革命做了积极的宣传工作。尽管南社后期出现分化，但其“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犹如睡狮之未醒”的深沉忧患，提出“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⑪的创作宗旨，自觉地把小说戏曲纳入启蒙教育和政治鼓动的轨道。其创作顺应时代潮流，弘扬高尚的民族精神，“读之令我国家民族之思想，攸然兴发，不能自己”^⑫。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近代文学为反对列强侵略，团结全民族共同战斗而呼号、呐喊。

作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文学的革新创造精神

文学的民族精神，是创作主体审美意识和民族情感的艺术体现，倾注了作家与时代同趋的历史使命感。在我国文学史上，凡具有人民性和艺术民族精神的作家作品，无不流注作家真挚的民族情怀和历史的责任心。屈原“恐皇舆之败绩”而写《离骚》，司马迁发愤而著《史记》，杜甫“穷年忧黎元”^⑬而笔耕不辍，白居易为“救济人病，裨补时阙”^⑭推衍新乐府运动。我们从宋元明清以来为世人所称道的作家作品中，无不深深感到作家为民族苍生有为而作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中国近代文学，如前所述，是在半封建殖民地社会和国家民族遭难的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从鸦片战争前后开一代诗风的龚自珍，到太平天国中的洪仁开、金和等人；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新派诗人，到辛亥革命时期南社同人的诗歌创作；从近代白话文运动到吴趼人、刘鹗、吴梅、黄吉安等的小说戏曲，直至青年鲁迅希望有精神界战士起“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⑮，等等。一大批近代作家、思想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为顺应时代潮流，为唤起民众的觉醒，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创作，凝聚着时代所赋予的文学革新创造精神。

一、高扬创作主体意识，批判封建的旧文化。鸦片战争后，严重的社会危机，刺激和唤醒了晚清文化人士的觉醒，使他们担当起批判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使命。如道、咸年间，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含包世臣、张际亮、张维屏、林昌彝、冯桂芬等）的经世致用学者，吸取今文经学主变致用的思想精髓，在“变易”思想的指导下，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汇成近代社会改革思潮，

对封建末世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在文学上，作家们不再把文学看成个人的事业，而时刻想到自己担负的时代使命。他们冲击封建道统罗网，冲破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创作模式束缚，提出诗文要面向现实，为世所用，“道附于事”，不尚空谈^⑩；他们崇尚心力，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对人才的摧残，倡言尊心、尊情、尊自然的文学创作“三尊说”，提倡“亦剑、亦箫”和以旷邈雄浑为美的浪漫主义精神。时至光绪中期，伴随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等为代表的爱国有识之士，奋起变法国强，在开展维新运动和译介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著作的同时，高举文学革新旗帜，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继续批判封建旧文化，反对桐城古文，着眼于时务，提倡新文体，努力朝着语汇合一的方向发展。随后有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文学评论家，继承了文学革新运动传统，把文学创作与反对封建专制政体同宣传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在反对同光体为代表的封建守旧文学的斗争中，高扬民族刚强之气和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进一步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传统文化的批评模式，促进了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我们从20世纪初陈天华、邹容、周实、宁调元、马君武、黄小配、朱祖谋、王钟声、黄节、吴梅、章太炎、秋瑾等人的作品中，从辛亥革命前后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的新体小说创作中，可深深地感受到作家们的“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⑪的高度责任心，以及“鬼雄如果能为厉，死到泉台定复仇”^⑫的为国家民族而创作的革新精神。

二、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自觉地用文艺启蒙群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了使文学成为变革社会和宣传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有力武器，近代文学家、思想家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他们论

诗，要求以现实斗争生活为题材，表现“忧时感事，悲愤伊郁之情”^{①9}；论文，则提倡平易畅达，切实有用之新体散文。其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评论家以革新政治相号召，以开放意识纵谈天下事，把审视的眼光投向外部世界，从文学与社会生活及政治斗争的联系中，实现着创作的个体情感向社会革新意识的转化，进一步强化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同样体现了近代作家、评论家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和时代同趋的革新精神。他们一是借鉴外国政治变革经验，提倡“政治小说”，用文艺激励爱国精神，提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认同“小说为国民之魂”^{②0}、“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②1}。二是竭力提高小说、戏剧在唤醒国民、开通民智中的地位和作用。梁启超把新小说与新民、新道德、新政治联系起来；王钟彭明确提出创作和研究小说旨在“以救国民”；陈去病提出戏剧“对同胞而发表宗旨，登舞台而亲演悲欢”^{②2}；三爱（陈独秀）主张“宜多新编有益风化之戏”，反对演淫戏和鬼怪戏^{②3}；春柳社同人认为无论演新戏旧戏都要“以开通民智鼓励精神”为宗旨^{②4}；林纾、魏易、吴棣、张春帆、陈家麟等人以振动国民爱国之气为己任，大量译介小说，等等。这许多对文学作用和价值观念的强化，固然是时代和政治宣传的需求，并存在片面夸大文学作用等缺点，但它们着眼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注意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包含着鲜明的时代意识。他们的评论和译著经常洋溢着作者关心国家安危以及为民族独立自强而作的满腔热情。

三、全方位开展文学革新运动，促进近代文学大众化、民族化方向的形成与发展。别林斯基说：“文学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②5}民族意识的增强与变化，必将引起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革。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凝聚而成的我国近代

进步作家的精神风貌，深深影响了近代文学，于世纪之交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全方位文学革新思潮。这场文学革新运动，涉及内容之广，文学形式之多，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学革新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学创作意向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其标志：一是新派诗的崛起和“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梁启超说：“过渡时期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⑥其时，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丘逢甲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在时代的巨大变革中，冲破传统诗歌体式的束缚，自觉担当运用诗歌反映现实斗争、创造新意境的任务。尽管新派诗初期出现过“颇喜扯拾新名词以表自异”等缺点，而他们以“诗歌革命”相号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所表达的爱国情思，却焕发出清新的时代气息。二是“文界革命”与新文体的诞生。我们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从辛亥革命期间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创作中，可以深深感受到由时代的巨变所凝聚的叱咤风云的气势，以及“确实使人热血沸腾”^⑦的民族自信心及感人的力量。三是“小说界革命”和新体小说的勃兴。自梁启超提倡“政治小说”、“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一方面他们不恰当地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存在简单化、口号式的创作倾向；但另一方面又激发了近代小说的创造热情和理论批评的发展，涌现出像梁启超、邱菽园、吴趼人、狄葆贤、黄人、李伯元、天僊生、林纾、黄摩西、徐念慈、曾朴、陈景韩、黄小配、黄伯耀、陈天华、苏曼殊等一批有识之士，起而从事小说创作和进行小说研究。继梁启超以创新精神创作《新罗马》、《劫灰梦》传奇后，辛亥革命前夕，一些具强烈爱国思想的剧作家更是奔走呼号，提倡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撰写了如《爱国魂》、《风洞山》、《警世钟》、《悬蚕猿》、《海国英雄》、《亡国痛》、《陆沉痛》，

以及《黄花岗》、《轩亭秋》、《开国奇冤》等剧目，透过戏曲形式革新，真实地再现了现实斗争风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包括理论宣传、创作实践和组建戏曲社团的戏曲改良活动。一批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评论家、戏剧家，如柳亚子、陈佩忍、吴梅、汪笑侬、陈独秀、王钟麒等人，创办杂志、撰写论文、评论剧作，积极担当戏曲改良重任，开始捕捉“泰西各文明国”戏剧演出信息。甚至连学者王国维也感于“吾中国之最大不振者莫若戏曲”，而潜心研究宋元戏曲，弘扬民族文化，寻求创作规律。近代进步作家、评论家正是在国难深沉的年代自觉担当起“唤醒国魂，开通民智”^⑧的神圣使命。他们与国家人民同命运，他们的创作和进行的文学革新活动，饱含着鲜明的时代品格和民族革命精神，扩大了新的读者群，开始形成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的审美创作意向。

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四十年前，郑振铎先生深刻地指出，晚清宣传民族革命之戏剧“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⑨这虽是对近代传奇杂剧所作的审美评价，但我认为，也是对整体近代文学精神的热情歌颂。鸦片战争后，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作家们踏着刀光剑影，在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凝聚集结、奋勇拼搏，为拯救民族危亡，肩负起历史使命，投身于现实斗争行列，从事文学创作与评论。他们是革命家，又是不懈追求的诗人、作家。在近代历史的变革中，他们于新的生活基点，积淀和实现着双重角色的认同。其壮怀激烈的高尚品德，那流溢在作品中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以及充满阳刚磊落之气的艺术风貌，引人思索，催人奋发向上。

第一，作家、艺术家躬身参加革命活动，为国家独立和维护民族尊严而战。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回顾辛亥革命期戏剧界情景时说：“我们戏剧界中曾经有许多前辈和同行以他们的英勇斗争和卓越的艺术创造，为这次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有不少人还因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在近代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④剧作家以戏剧艺术为武器，几乎摒弃了对才子佳人和爱情离合缠绵的描写，而注重从现实斗争生活中吸取创作题材，藉以鼓吹革命，弘扬爱国革命精神。洪楦园作《警世钟》，号召国民团结战斗，共同抵御外侮；筱波山人编撰《爱国魂》，倡言“我是鞠躬尽瘁一腔忱，未扫除胡儿恨不平”，吴梅谱写《风洞山》，高歌“军声壮，阵法多，半壁江山全仗我”。当时大批爱国青年学生、演员和新剧名角，都怀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自觉地投身于革命与戏剧的战斗行列。如京剧演员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参加过攻战江南制造局光复上海的战斗；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王钟声，回国后在上海以禁烟委员身份进行活动，辛亥革命时期间又任沪军都督府参谋，不幸于赴天津召集剧界人士起义时被捕，牺牲时仅三十五岁。湖北艺人刘艺舟，曾组织剧团到东北作宣传活动，其自编自演《石达开》一剧，以慷慨激昂气势，使观众感动流泪。南方的不少粤剧艺人参加兴中会、同盟会，利用到香港、南洋演出机会，为革命组织运送武器，等等。

崇高的献身精神是时代的象征，是作家高洁心灵和情感意向的体现。近代作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战的时代精神，还广泛体现在抒情记事作品所展示的时代氛围中。林则徐一生忧国忧民，他以政治家的身份，在国家蒙难之际，怀着“苟有裨（音bì）国家，虽顶撞捐糜，亦不敢自惜”的献身精神，写下了许多

系念国家安危的感人肺腑诗文；张维屏以“风人慷慨赋国仇”的家国意识，写出了如《三元里》，《三将军歌》等颂赞民族气节的动人诗章。张际亮云：“慷慨毙千酋，协恭亏大节”^⑪，朱琦道：“公死复何憾，公名日星垂”^⑫。我们从张际亮、朱琦、姚燮、鲁一同、贝青乔、林昌彝等人的诗歌所描绘的爱国将士英勇抗敌的感人场面中，可深深感受到中华儿女的忠义正气，以及为捍卫国家主权而献身的崇高民族气节。变革时代，铸造了作家的精神境界和大无畏献身精神。谭嗣同为维新变法，矢志不移，以其高洁的人格，书写下“我自刀横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⑬以及“有心杀贼，死得其所”的铮铮誓言，并化作国魂，一直感动后来人。唐才常统领自立军起事，失败后为张之洞害于滋阳湖畔，就义前高歌“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⑭，无私无畏，被害时才三十三岁。邹容撰写气势磅礴的“《革命军》，鼓吹革命，激于义愤，自己投狱并死于狱中，年仅二十一岁。陈天华作《狮子吼》、《猛回头》，撰《革命方略》，留下万言《绝命书》，死时才三十岁。周实烈士早年加盟南社，诗作慷慨慕义，奋为鬼雄，作品甚丰，但不幸被反动派阴谋杀害，被害时才二十六岁。南社著名诗人宁太一，从日本奋然回国，参与筹建南社和讨袁活动，不料事泄被捕，就义时四十一岁。秋瑾“慷慨雄谈意气高，拚流热血为同胞”^⑮，她豪情亢爽，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所作诗忠肝义胆，情感激烈，年仅三十岁遭捕壮烈牺牲。革命文豪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前，主持《民报》，并以其学识渊博显赫于时，其所作政论散文，以“雷霆之声”和所向披靡之势独树一帜。其他如小说家黄小配、诗人兼小说家苏曼殊，以及南社革命诗人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马君武等等。他们是国家民族的代表，怀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以诗文抒写义愤，凭吊烈士忠魂，赞颂民族气节，汇集了由新型的作家群所凝

聚的近代文学感人至深的正气歌。

第二，选取历史题材，歌颂民族英雄，用于群众宣传，呼唤民族革命气节。我国近代社会，国力衰弱，但民气高昂；民族危机四伏，而又英雄辈出。这种由残酷现实所引发的文化心态反差，使近代进步作家意识到，要唤醒民众、激发民情，还必须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固有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视历史题材的选取，透过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歌颂，以古喻今，言志寄慨。还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就于《武侯庙观琴》、《过紫柏山留侯庙》、《汤阴谒岳忠武祠》、《题文信国手札》等诗作中，对诸葛亮、张良、岳飞、文天祥等名臣良将作了热情的礼赞。姚燮《贺新郎·宋信公文丞相铁如意》：“凭河山，似瓮悲古裂，歌《正气》，唾壹缺。”通过咏铁如意，颂赞文天祥的英雄业绩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吴沃尧创作小说，重在揭露、谴责社会的种种罪恶，但亦强调历史小说的创作，其所撰《痛史》，取材异族入侵南宋的历史故事，暴露南宋政治腐败，热情歌颂文天祥、谢枋得、张士杰等民族英雄，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献身精神。俗语道：“读史可使人警醒、聪明。”李伯元写作《庚子事变弹词》，意在借庚子事迹的描写，让人们从“哭喊之声不忍闻”的历史事件中，激发对列强侵略者的憎恨。其他如吴梅借明末翟式耜兵败桂林，被执不屈的故事，而谱写《风洞山传奇》；黄吉安借文天祥囚燕都三年从容尽节，以及陆秀夫、张世杰抗击元兵相继殉国的感人事迹写成川剧《柴市节》、《三尽忠》；汪笑侬广泛运用借古喻今手法，编演《哭祖庙》、《三骂》等时事京剧，等等。均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舞台形象的创造，谱写和赞扬中华英烈的刚毅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当时许多评论家充分认识选编历史题材歌颂民族英雄，在振奋民心中的价值和意义，主张“以吾侪中国昔时荆轲、聂政、张良、南霁

云、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王阳明、史可法、袁崇焕、黄道周、李定国、瞿式耜等大英雄之事迹，排成新戏，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极有益。”^⑤有的提出要尽快改正我国剧坛“旧日喜阅之寇盗、神怪、男女数端”，可以“复取西国近今可惊、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如波兰分裂之惨状，犹太遗民之流离，美国独立之慷慨，法国改革之剧烈”等等，详其历史、摹其神情，从而使观众“鼓舞奋迅，而起尚武合群之观念，抱爱国保种之思想”。而南社进步诗人论诗“重气节与人品”，更加崇尚先烈们的“孤忠亮节”，“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取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头颅如许负英雄！”^⑦在他们的诗作中，随处可以看到作者对文天祥、郑成功、张煌言、夏完淳等著名民族英雄的歌颂，展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三，注重作家作品评论，藉此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精神。这一时期的作家、评论家或着眼于新时代氛围，重新审视我国古典文学的美学价值；或办文学刊物，广辟专栏，从文学论争中倾注强烈的爱国民族感情；或通过译介外国文学名著，振奋国人的民族精神。评论方式有专题论文，亦有随笔、短论，既有诗话、杂评，亦有楹联、题辞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例如，当时就有评论者在《小说丛话》中提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是“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他们于近代社会文化背景上，从文学与社会、民族的联系中，重申了小说艺术创作的真实性原则，指出《水浒》是施耐庵“痛心疾首于数千年专制政府”而作，是一部“愤世人之作”^⑧，《金瓶梅》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镜花缘》是“理想小说、科幻小说”，等等。评论者不为传统观念所囿，而是从新的角度努力探索深藏于我国古典作品中的审美意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梁